



西夏皇室和敦煌莫高窟刍议

史金波

享誉世界的艺术宝库敦煌莫高窟自建窟开始，历经千年，开窟近五百，内藏艺术珍品无算。西夏立国西北，掩有敦煌近两个世纪，除唐朝外，是统辖敦煌时间最长的王朝。西夏皇室笃信佛教。第一代皇帝元昊之父德明“晓佛书”，曾遣使至宋朝修供五台山十寺。元昊“晓浮屠学”，规定每一季的第一个月的朔日（初一）为“圣节”，令官民礼佛。西夏先后6次向宋朝求赐大藏经，并用西夏文翻译大藏经3600余卷；大兴土木，广建佛寺佛塔，于贺兰山兴建北五台山寺；在中央机构中设二功德司，管理佛教；封设帝师，在中国历史上首开帝师先河；众度僧尼，大兴法会，广施佛经；大力吸收藏传佛教，使藏传佛教迅速东传。佛教在西夏受到法律保护 and 优待，在宗教信仰中始终占据优势地位。在这种浓重的佛教信仰氛围下，作为佛教圣地的敦煌莫高窟自然受到西夏官民的特别青睐。存留于莫高窟众多洞窟中的西夏佛教艺术珍品，是西夏尊崇莫高窟的历史见证。然而西夏时期皇室和莫高窟有何关系，尚乏论及。笔者不揣班门弄斧之嫌，试用西夏文献资料结合莫高窟的壁画，做初步探讨。

—

1964年笔者有幸参加由中国科学院民族研究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室前身）和敦煌文物研究所（敦煌研究院前身）共同组成的敦煌洞窟西夏调查研究小组。研究小组经3个月实地考察，对相关洞窟从文字题记至艺术风格做了科学记录和研究，最后将原来认为莫高窟只有几个西夏洞窟改定为80多个西夏洞窟，大大改变了对莫高窟洞窟布局的认识。这是把西夏考古、艺术、文字、史料结合在一起的一次合作研究尝试，不仅开拓了西夏艺术研究，还在西夏学的进程中首创多学科合作研究，汇集不同学科的专家，采用综合研究方法，取得重大进展。^①后来敦煌文物研究所整理出版的《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中记载，莫高窟有82个西夏洞窟。^②

关于西夏占领沙州（今甘肃省敦煌）、统治沙州的时间问题，近二三十年来在学术界争议不断。与此

① 白滨，史金波：《莫高窟、榆林窟西夏资料概述》，《兰州大学学报》，1980年2期；刘玉权：《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西夏洞窟分期》，《敦煌研究文集》，1982年3期。

② 敦煌文物研究所整理：《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183~184页。

相关的莫高窟洞窟分期问题，有的专家也发表了不同见解，提出将原划为西夏洞窟第2、3期的洞窟划为沙州回鹘洞窟，莫高窟的西夏洞窟剩下62窟。^①这又引起专家们的讨论。陈炳应教授发表《11世纪存在过统治瓜、沙二州的回鹘汗国吗？——西夏统治瓜沙始年考》一文，指出西夏在1036年攻占沙州后就一直统治着瓜、沙二州，但对州城以外边远的回鹘民族实行非常宽松的羁縻政策。^②我赞同炳应教授的意见。在西夏1036年占领沙州后，不存在一个长达几十年的沙州回鹘汗国，也不存在一个在西夏境内独立的沙州回鹘政权。

西夏是一个多民族王朝，境内除主体民族党项族外，尚有汉、吐蕃、回鹘等民族。在西夏，回鹘不仅是主要民族成员之一，而且回鹘人可以做官，甚至可以做高官。西夏早期在兴庆府建高台寺翻译西夏文佛经时，即“广延回鹘僧居之，演绎经文，易为蕃字”^③。当时主持译经的回鹘僧人白法信、白智光都是国师。国师在西夏不仅是地位崇高的佛教领袖，也是地位很高的官员。^④

西夏法典《天盛改旧新定律令》（简称《天盛律令》）规定：

任职人番、汉、西番、回鹘等共职时，位高低名事不同者，当依各自所定高低而坐。此外，名事同，位相当者，不论官高低，当以番人为大。^⑤

此条系规定西夏官员在一起包括上朝时的位次，从中可知回鹘人也有在西夏朝廷中为官者。很明显，西夏的回鹘人是西夏人。

既然沙州在西夏时期一直为西夏掩有，这一时期在敦煌建造、重修的洞窟都应视为西夏洞窟。

在莫高窟中，是西夏还是回鹘洞窟，有争议的可以409窟为代表，因为该洞窟主室东壁门南北两侧绘大型窟男女供养人像，南侧男供养人究竟是西夏皇帝，还是回鹘王，成为问题的焦点。其服饰的特点当然更受到特别的关注。

衣服不仅有御寒蔽体的实用价值，也有美化装饰的文化意义。一个民族各行业有不同的装束，男女老幼的打扮差别也很大，四季的服饰也因季节变化而不同。后来服饰逐渐染上政治色彩，在社会中还有别等级、明贵贱的功用，各阶层有不同的服饰。中国古代把服饰看作是“礼仪”的一部分，在物质和精神两个层面都发挥着重要作用。服饰成了标识、维护上下等级关系和长上尊严的象征之一。

西夏在元昊即位之初，立国之前就效法中原地区的服饰制度，规定西夏文武官员衣着：

文资则幞头、鞞笏、紫衣、绯衣；武取则冠金帖起云镂冠、银帖间金镂冠、黑漆冠，衣紫旋襴，金涂银束带，垂蹀躞，佩解结锥、短刀、弓矢鞬……便服则紫皂地绣盘球子花旋襴，束带。民庶青绿，以别贵贱。^⑥

可以看出，西夏文职官员的装束多因袭唐宋，而武职的服装却颇有民族特色，与中原服饰不同。这大概和西夏初期文官汉族人居多，武职中又以党项人为主的情况不无关系。元昊登基称帝时给宋朝上的表章中称“改大汉衣冠”“衣冠既就”当指上述所定服饰制度。

① 刘玉权：《敦煌西夏洞窟分期再议》，《敦煌研究》，1990年3期。

② 陈炳应：《11世纪存在过统治瓜沙二州的回鹘汗国吗？——西夏统治瓜沙始年考》，《敦煌研究》，2001年2期。

③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18。

④ 史金波：《西夏佛教史略》，宁夏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6页，第77~79页。

⑤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10“司序行文门”，第378~379页。

⑥ 《宋史》卷485《夏国传上》。

西夏政府对民庶服饰的规定主要是从颜色进行界定，民庶只能穿青绿色的服装，而官员才可穿紫色、绯色衣装，以此区分贵贱。北宋时接待夏国使臣，记录夏国大使、副使皆穿“绯窄袍”，可为例证。^①这与中原地区一样，以服制维护上下等级的尊卑。

西夏乾祐年间刻印的大型西夏文类书《圣立义海》第8卷主要内容是西夏服装，其目录有“皇太后、皇帝法服，皇后法服，太子法服，嫔妃法服，官宰法服，朝服，常服，时服”。^②可见西夏政府从制度上明确了各类人员，特别是统治阶层的西夏帝王、后妃、官员服饰的规定，并载于官修典籍。这说明西夏政府对服饰制度的重视和区分的细致。可惜此卷的正文已经残失。根据《圣立义海》的体例，目录中每一项都包括若干词语，每一词语都有详细注释，因此尽管遗失的正文中关于服饰的具体名称和形式难以尽知，但可推知内容应相当丰富。

法服是礼法规定的服饰，大抵用于祭祀、典礼等隆重、正式的场合。西夏对皇室成员及官员的法服分类详细。朝服主要用于上朝朝会，也用于献祭。常服和时服则是平时随季节变化的常用服装。

国家往往对服饰发出禁令。如宋太平兴国七年（982）李防请禁“近年品官绿袍”下服紫色。端拱二年（989）禁民间服紫^③。嘉祐七年（1062）“禁臣僚公服黑紫色”^④。

西夏也是如此。如《天盛律令》对西夏官员、僧道、民庶的服饰作出了严格限制，特别明令禁止使用是皇帝专用的衣服颜色、特殊的装饰花样和贵重饰物，违者处以徒刑。《天盛律令》规定：

节亲主、诸大小官员、僧人、道士等一律敕禁男女穿戴乌足黄（汉语石黄）、乌足赤（汉语石红）、杏黄、绣花饰金、有日月，及原已纺织中有一色花身，有日月，及杂色等上有一团身龙（汉语团身龙），官民女人冠子上插以真金之凤凰、龙样一齐使用。倘若违律时，徒二年。^⑤

可见西夏法律规定在穿戴上对包括亲王（节亲主）在内的官员除禁某些颜色外，还禁止团身龙等纹饰，这种纹饰只有西夏皇帝才可使用。

再来看敦煌莫高窟第409窟供养人的服饰。该窟东壁门南有一高大男供养人，像高167厘米，是一幅等身像。身穿圆领窄袖袍，上可见绣大型团龙11幅，若按对称原则计数，至少有12幅团龙。有的专家将此供养人的服饰与新疆回鹘可汗供养像比较后认为，他们的服饰相近，因此推论409男窟供养人为回鹘可汗。笔者认为409窟男供养人与新疆洞窟的回鹘可汗供养人的服饰有很大区别。新疆伯孜克里克石窟第45窟原有一身回鹘可汗供养像，身穿红色圆领窄袖团花锦袍，吉木萨尔县北庭遗址高昌回鹘佛寺壁画中残存的回鹘王供养像，身穿圆领窄袖红色长袍，袍上有圆圈纹饰。这两幅回鹘可汗供养像皆穿圆领窄袖红色长袍，袍上一有团花，一有圆圈文饰。而莫高窟409窟供养人虽也穿圆领窄袖袍，但袍上是全身团龙文饰。似乎到目前为止尚未见到回鹘可汗穿龙袍的文献记载和形象资料，也未见到有关回鹘王国有团龙纹样服饰的规定。上述西夏文献明确记载只有皇帝才能有“一身团龙”的纹样。若将409窟有一身团龙的等身供养人看作是西夏皇帝是顺利成章的，若看成是回鹘可汗则似乏依据。西夏管辖敦煌近两个世纪，在敦煌莫

① 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6“元旦朝会”。

② 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圣立义海研究》，第48页。该书李范文专论中将目录的“服”多误译为“藏”，如“皇太后、皇帝法藏、皇后法藏、太子法藏、嫔妃法藏、官宰法藏、界服，勤藏，常藏”。见第29页。

③ 《宋史》卷153《舆服志五》。

④ 宋（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73，神宗熙宁九年（1076）二月丁酉条。

⑤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7“敕禁门”，第282页。

高窟修建或重修数十个洞窟，在其中绘制皇帝的供养像应该是可以理解的。

再看此 409 窟男供养像后有侍从持御用华盖、翬扇等物，这也是皇帝才能有的仪仗。《天盛律令》规定：“官家（皇帝）来至奏殿上，执伞者当依时执伞，细心为之。”^①伞即华盖，可见，西夏法典规定皇帝有华盖，与此图同。也证明这是皇帝而非王的形象。

在莫高窟有回鹘民族特点的洞窟是可能的，甚至有回鹘王供养人的洞窟也是可能的，因为西夏是多民族的王朝。但如果带有团龙图案服饰的回鹘王供养人出现在洞窟中则是明显僭越举动，是不大可能的。退一步讲，假若 409 窟是沙州回鹘王的供养人，在后来西夏管理沙州漫长的岁月中，西夏的统治者对这种明显僭越的壁画，也不会容许它存在。西夏重新装修大批洞窟，对这种在西夏管辖区的违犯法的冒犯皇帝的壁画，大概会毁弃重修。

将 409 窟男供养人与榆林窟第 29 窟西夏男供养人做一比较也许更有助于分析这一问题。榆林窟第 29 窟西壁南侧和北侧各有男女供养人像两列，男供养人上列以高僧鲜卑智海为先导，后有施主沙州监军赵麻玉等供养人 7 身，后三身为侍者。此窟明确为西夏窟，窟主及其眷属皆以西夏文题记标明职官、姓名、身份。莫高窟 409 窟与此窟窟主身份不同，莫高窟 409 窟是皇帝，榆林窟 29 窟是地方武官。但两图又有很多相似之处：

1. 两窟主均戴尖顶毡帽，只是皇帝的是白色，地方武官的是黑色，皇帝的帽子更高；
2. 男供养人皆穿圆领长窄衫，要系带；
3. 两图的眷属中都有幼儿形象，身材短小，皆不足大人一半高；
4. 身后皆有侍者，虽是成人，与窟主比较矮小很多，不成比例，着意显示贵族与侍者明显的等级差别。

这些类似的服饰和布局特点也可以作为同时代洞窟的参考标志。

当然应该注意到 409 窟的男供养人服饰与《西夏译经图》^②中的西夏皇帝服饰、黑水城出土的《西夏皇帝及随员图》^③中的皇帝服饰皆非同一类型。这并不难解释。前述西夏文《圣立义海》规定西夏皇帝、官员有法服、朝服、常服、时服之分。在西夏无论皇帝、后妃、官员，甚至普通百姓，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季节穿着不同类型的服装是很正常的。

西夏是多民族王朝，善于将不同民族文化熔铸于一炉。在各民族长期接触、交往中，西夏服饰中会含有党项、汉族、回鹘等多民族特点。在莫高窟、榆林窟的西夏供养人服饰中出现与汉族、回鹘民族相近的特征正反应了当时各民族间最普通不过的文化交融现象。

二

西夏始终崇信佛教，皇室成为带动佛教发展的龙头，为此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举凡重大振兴佛教的举措，多为西夏皇室直接倡导、组织。如西夏 6 次向宋朝赎取大藏经，皆为皇室出面向宋朝皇帝申奏。

① 史金波，聂鸿音，白滨译注：《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卷 12 “内宫待命等头项门”，第 430 页。

② 史金波：《西夏译经图解》，《文献》（第 1 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79 年。

③ （俄）萨玛秀克：《西夏艺术作品中的肖像研究及史实》，《国家图书馆学刊》，2002 年西夏研究专号。

翻译数千卷西夏文佛经也是皇室主持，甚至译者署名也是以皇帝、皇太后的名义。在元昊立国之初，广泛搜集舍利，并大兴土木，建佛舍利塔，于大庆三年（1038）建成，西夏右仆射中书侍郎平章事张涉奉制撰写铭文，显然此次重要佛事活动是西夏第一代皇帝元昊的杰作。^①天祐垂圣元年（1050）在位的毅宗仅有两岁，没藏皇太后兄妹掌握朝政，皇太后在首都兴庆府兴建承天寺，动用“兵民数万”，寺内瘞佛顶骨舍利，福圣承道三年（1055）建成。^②崇宗乾顺天祐民安四年（1093），由皇帝、皇太后发愿，动用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重修凉州护国寺感通塔及寺庙，第二年完工后立碑赞庆，崇宗之舅、国相梁乞逋亲自前往主持仪式，十分隆重。兴办这样一次大的佛事活动，可能是为了给10周岁的皇帝祈福。^③6年后甘州僧人法净于张掖县西南首浚山下掘得古佛卧像三身，献于乾顺，乾顺于贞观三年（1103）在甘州建宏仁寿，规模宏大，即后来的卧佛寺。^④仁宗乾祐二十年（1189）由皇室在大度民寺组织了一次长达10昼夜规模宏大的法会，请三位国师及禅、法师等，散施佛经25万卷佛经。

莫高窟在西夏占有特殊的地位，在莫高窟西夏题记中有所谓“圣宫”、“朝廷圣宫”^⑤，即是对莫高窟的称誉，可见莫高窟在西夏佛寺中的崇高地位。^⑥修建或重修洞窟需要大量财力、人力，在西夏这样偏安西北地区的王朝，经济力量有限，大型的佛事活动应以皇室或地方政府为主。由此可以推想，大规模修建敦煌莫高窟洞窟也应是西夏皇室所为。

在考察西夏洞窟壁画时，除对大铺壁画的内容、布局、风格给予重视外，对洞窟壁画的装饰图案如藻井、四披、龕眉、边饰等也要特别留意。其中因藻井所处位置的独特，应给予格外的关注。敦煌莫高窟很多洞窟内窟顶是覆斗形，藻井即窟顶部中央最高处的装饰，至高无上，俯视全窟，位置十分显眼。其形制呈方形，由井心、井外边饰、垂幔三部分组成。井心向上凸起，四边为斜坡面，上窄下宽，构成覆斗形状。藻井名称依井心图案确定。

西夏洞窟中以龙或凤为图案的藻井十分普遍，龙、凤藻井成为西夏壁画的一大特点。依据《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记载，在莫高窟有关西夏洞窟中，有覆斗形窟顶的洞窟占多数，有69窟，其中以龙、凤为藻井的最多，共32窟。这32窟中以龙图案为井心的藻井29窟，以凤为井心图案的藻井2窟，另有1窟既有龙，又有凤。其次为团花图案井心，有17窟。此外有卷瓣莲花井心、交杵井心、四瓣花井心、法轮井心、莲花法杵井心等。^⑦

下面将有龙、凤图案的洞窟及其井心纹样开列于下：

6窟（团龙鸚鵡井心）、29窟（团龙卷瓣莲花井心）、34窟（浮塑团龙井心）、35窟（浮塑团龙井心）、55窟（窟顶藻井画双龙卷瓣莲花井心）、65窟（浮塑团龙井心）、69窟（团龙井心）、78窟（浮塑团龙井心）、83窟（浮塑团龙井心）、97窟（团龙井心）、130窟（团龙井心）、169窟（团龙井心）、223窟（浮塑团龙井心）、234窟（五龙井心）、237窟（前室顶浮塑团龙，主室窟顶三兔卷瓣莲花井心）、

① 《嘉靖宁夏新志》卷8。乾隆四十五年修《宁夏府志》卷19。

②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19。

③ 张澍：《书天祐民安碑后》，《养素堂文集》卷19，清道光十五年刊本。大云寺，西夏时期为护国寺。张澍记该碑发现于武威清应寺内。

④ （清）吴广成：《西夏书事》卷31。

⑤ “朝廷”二字，在西夏文中原意为“世界”，又可译为“朝廷”或“京师”，这里可译为“朝廷”。

⑥ 史金波，白滨：《莫高窟榆林窟西夏文题记研究》，《考古学报》，1982年3期；刘玉权：《敦煌莫高窟、安西榆林窟西夏洞窟分期》，《敦煌研究文集》，1982年3期。

⑦ 敦煌文物研究所整理：《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文物出版社，1982年。

238窟（主室窟顶藻井画盘龙团花井心）、245窟（团龙井心）、252窟（团龙莲花井心）、310窟（团龙井心）、327窟（浮塑团龙莲花井心）、344窟（浮塑团龙井心）、345窟（浮塑团龙卷瓣莲花井心）、347窟（浮塑团龙井心）、351窟（浮塑二龙戏珠井心）、363窟（团龙井心）、366窟（浮塑团凤井心）、367窟（浮塑团凤井心）、368窟（浮塑团龙井心）、400窟（双龙井心）、450窟（二龙戏珠井心）、16窟（浮塑彩绘团凤四龙井心）。

西夏洞窟的龙、凤藻井占西夏覆斗形洞窟藻井的比例占将近一半，这类龙凤藻井不仅数量多，而且艺术水平很高，把莫高窟的藻井艺术提高到一个新的高度。如莫高窟310窟顶部的团龙藻井，中央是栩栩如生的团曲龙形，龙首巨口张开，长舌弯翘，一爪持珠置龙首前，龙身盘旋飞腾，气势如虹，四角配以朵云，构图新颖奇特。245窟的团龙藻井，则又由团龙和周围的卷草纹组成美丽的图案。第400窟藻井绘制了两条凤首龙形的怪兽，这种奇特的复合式造型，表现了西夏的艺术家们的丰富想象力和创新精神。

16窟的藻井更显现出绚丽多姿的色彩，覆斗形长方形藻井井心浮塑彩绘一团凤、四游龙。中间为浮塑描金的凤凰，两翅展开做翱翔状，自然舒展而有力，凤尾自然盘卷，外围卷瓣莲花，四角各有一浮塑描金的游龙。凤首、凤羽、龙头、龙爪，生动自然，都显示朝一个方向飞腾、旋转、追逐之势，真是龙飞凤舞，使藻井井心具有鲜明的旋动感。龙、凤是中国传统艺术的装饰图案，而用描金、堆金等手法装饰窟顶，使之更加艳丽、华贵。此藻井色彩对比鲜明，以绿、朱、金等颜色使色调达到既热烈明快，又稳重雅致的效果。井心外围套叠大小不同的长方形框，花纹图案稳重规矩，色彩浓淡相间，更衬托出井心的鲜丽色调和活泼动态，增加了装饰效果，是西夏藻井图案中的上品。

龙、凤不仅是吉祥的象征，后来还被赋予了政治的意义。龙往往是皇帝的象征，凤是后妃的象征。前述西夏《天盛律令》不准民间以龙、凤做装饰的规定，正是这种中国式传统认识的法律化。莫高窟西夏洞窟中大量龙、凤藻井是否也可以作为这些洞窟为西夏皇室修造的重要参考。

榆林窟是西夏洞窟集中的又一个窟群，其中有西夏洞窟10窟。第2窟也有团龙藻井，体态优美，屈伸自如，红、白点缀成珠粒般的鳞甲，使龙身光滑而富立体感，团龙外以黑、红、白、绿色相间的箭簇纹与飞龙逆向旋转，增添了龙急速旋转的动感。该窟西壁南北两侧各有一幅西夏时期绘制的《水月观音图》，都很精彩。原敦煌莫高窟中的水月观音图皆为小幅，西夏晚期发展绘制成大幅。北侧水月观音图在右下角有玄奘取经图。整幅《水月观音图》巧妙的构思、杰出的造型和精湛的画技，达到纯熟的水平，是西夏绘画艺术的代表作。带有精美、大气的壁画、又有团龙藻井的洞窟也许是西夏皇室修建。西夏仁宗皇帝笃信佛教，他曾西巡至河西走廊的甘州^①，是否到过敦煌不得而知，但他继续西行到敦煌朝佛也是可能的。

在敦煌莫高窟中还有几个有龙形象藻井的洞窟定为五代、宋朝洞窟。五代的32个洞窟中有5窟有龙的藻井：53、61、78、98、146窟，其中第78窟明确为西夏浮塑团龙藻井，有的专家将此窟划为西夏洞窟。宋代的43个洞窟中有10窟有龙的藻井：25、35、65、130、136、230、368、449、454、467窟。有的专家将其中35、65、130、368窟划为西夏洞窟。^②此外从《莫高窟内容总录》还找到以下

^① 史金波：《西夏的藏传佛教》，《中国藏学》，2002年1期。

^② 敦煌文物研究所整理：《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文物出版社，1982年。第182~183页。

有龙的藻井的洞窟，其中唐代仅 1 窟（57），五代、宋 5 窟（22、334、369、392、449），元代 1 窟（3）。西夏大批洞窟系从原认为是五代、宋窟中剥离出来，笔者不揣冒昧地建议，是否可再对带有龙藻井的洞窟重新审视，它们究竟是五代、北宋的洞窟，还是西夏的洞窟？即便是五代、北宋的洞窟，还可以对藻井专门进行分析，这些带有龙的形象的藻井究竟属于何时代？也许西夏重修洞窟时对有的洞窟着重修了藻井（包括井心及四披）。

以凤为中心的藻井和凤首龙形的藻井是西夏洞窟的另一值得关注的之点。这种藻井似乎在过去尚未出现过。西夏前期接连三朝太后专权，这种以凤为中心的藻井是否与西夏太后执政有关。可能西夏皇太后掌权时期，为了彰显太后至高无上的地位，在莫高窟重修的洞窟中将制高点藻井井心刻意绘制成凤的形象。传世的西夏文佛经中，凡皇太后执政时翻译的佛经，在卷首的译者题款都是先写皇太后，后写皇帝。惠宗时的译经写“天生全能、禄番佑圣、式法皇太后梁氏御译，就德主世、增福正民、明大皇帝嵬名御译”；崇宗时的译经写“胜智广禄、治民集礼、德圣皇太后梁氏御译，神功胜禄、习德治庶、仁净皇帝嵬名御译”。^①重修凉州护国寺感通塔碑中也是皇太后尊号在前，皇帝尊号在后。^②莫高窟中出现以凤为中心的藻井合乎西夏的习俗。

以龙为中心图案的藻井在后世仍然流行不绝。有的在皇宫内，如沈阳故宫大政殿内彩绘梵文天花，中有团龙藻井，龙口衔一铜胎中空的水银球（轩辕镜）。又如北海公园极乐世界殿，原为观音殿，殿中央是金光灿灿的八角穹窿团龙藻井，藻井的中央有一条口含宝珠的坐龙，48 条行龙环绕周围，尽显皇家的庄严气象。



（作者通讯地址：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北京 100081）

① 史金波：《西夏译经图解》，《文献》（第 1 辑），书目文献出版社，1979 年。

② 《西夏佛教史略》，241~250 页。